

明代卷

陆建芳 主编



张尉 著

中国 玉器 通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玉器通史

陆建芳 ● 主编

明 代 卷

张 尉 ●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玉器通史. 明代卷 / 陆建芳主编 ; 张尉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507-0384-1

I. ①中… II. ①陆… ②张… III. ①古玉器—文化
史—中国—明代 IV. ①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9486号

中国玉器通史·明代卷

ZHONGGUO YUQI TONGSHI · MING DAI JUAN

总 策 划 尹昌龙

出 品 人 陈新亮

出版策划
项目负责人 于志斌

责任编辑 张小娟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设计 李松璋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 (批发) 83460397 (邮购)

设计制作 南京书衣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33133493)

印 刷 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875

字 数 346千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

定 价 24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玉器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陆建芳

副 主 编 曾卫胜 孔富安 张宏明 刘云辉

张 尉 李银德 方向明 周晓晶

喻燕姣 吉琨璋 欧阳摩壹

编委会委员 于 明 于志斌 于宝东 孔富安

(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 刚 方向明 王志高 古 方

左 骏 刘云辉 吉琨璋 吴 沫

张 彤 张 尉 张宏明 李银德

陆建芳 陈桂祥 周晓晶 欧阳摩壹

喻燕姣 曾卫胜 韩建武

总序

2006年，陕西发掘出著作《考古图》及《考古图释文》的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之墓，被盗墓中还有墓主收藏的汉代玉璧等文物。此事说明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至迟应始于宋代。不过，由吕大临至清代吴大澂是以金石学的方法进行古玉研究的，他们缺乏层位依据，因而他们的古玉研究只能以文献为主要依据，所得结论常有谬误，亦无法以实物进行核证。

20世纪30年代，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前辈将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后^[1]，国学基础深厚的李济、郭宝钧、夏鼐、郑德坤等先生均做过古玉研究。由于政治的原因，这种学术研究缺少沟通，因而并未形成大气候。而且，对出土文物的研究，相当一段时间是以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的顺序来反映其重要性。玉器类文物在考古发掘报告中只能列入“其他”类别。我们阅读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发掘报告，难以找到一张古玉的彩照，古玉的线图多不具备。考古界普遍忽视玉器的研究。直到1986年，辽宁牛河梁遗址和余杭反山墓地业已出土了数以千计令世人震惊的精美玉器，以研究陶器为主流方向的考古界某些权威仍然不为所动，仍对研究玉器颇有微词，并视之为不务正业。

【1】程旭主编：《金锡璆琳——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文物》，三秦出版社，西安，2007年。

20世纪后20年，国家兴起的城乡建设热潮使抢救性发掘成为中国考古的最大任务，随之而来的则是各地各类古玉层出不穷。大量古玉的出土，直接导致了古玉研究三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迫使考古界正视玉器这类遗存在古代历史中的价值和地位。考古界素来擅长以陶器类遗存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问题，但并不擅长研究玉器这类意识形态的产品。换言之，考古界擅长物质文化的研究，却拙于精神文化的研究。古玉的大量出土改变了这一倾向。

第二，按照牟永抗先生所言：“以玉件在墓内方位分布为基础的……（玉器）组合复原研究，为古玉社会功能探索开辟了新的途径。”^{【1】}一些流传于世的散件玉器，其功能性质得以澄清，文化归属也得以确认。原有的古玉研究基础发生了动摇，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古玉研究的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1992年，杨伯达先生为主编，综合了历史研究和考古学研究诸方面人才，合力编著并出版了《中国玉器全集》。《中国玉器全集》第一次向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古玉研究资料 and 比较合理的古代玉器发展分期。在此之前，牟永抗、吴汝祚在1990年张家港召开的“东南地区古代文化研讨会”上依据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出玉器，第一次提出了“玉器时代”的观点，认为史前“玉器时代”的存在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有别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点。

第三，一批第一线的考古学者因为“遭遇大量古玉出土”而对古玉产生兴趣，从而走上研究道路，成为当前古玉研究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史学、地质学、文化学、工艺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加入了古玉研究队伍。社会上形成了古玉研究的热潮，风行古玉收藏。

2000年是中国古玉研究的重要分水岭。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直接参与并规划了古玉研究，此举从根本上改变了考古界轻视玉器研究的现象。费孝通认为，在世界诸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国人有爱玉尊玉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自8000年前至今始终没有中断。爱玉尊玉的历史后面应该有

【1】牟永抗：《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东方博物》，杭州大学出版社，杭州，1997年，第11页。

中华民族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因此，“弄清楚玉器本身发展变化的历史，透过玉文化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是反映了时代要求的，而且很急迫。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1】}。

在费孝通的倡议下，中国考古界以“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为主题，自2001年起连续在辽宁沈阳、浙江杭州、四川成都等地召开了学术会议，以古代玉器为切入点，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中国考古界开始真正地从偏重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逐渐转变到对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的研究中来。这种改变既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也整体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水平。

以目前所见资料看，笔者初步认为，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玉阶段（约8000年前至约5500年前）

相信在初始阶段，古人并未把玉石完全分开，玉只是石中之美者。美石为玉是长时间存在的一种观念。这个阶段的玉器有两个特点：一、凡异于一般石材的美石均被当成玉来对待。软玉、蛇纹石、蜡石、燧石、绿松石、煤精等在此阶段均大量可见，可称这个阶段的玉为杂玉。二、玉器均为小件，品种单纯，有管、珠、玦、璜、坠，晚段出现玉琮类特殊器形。但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玉器以人身装饰件为主。值得强调的是，史前太平洋西岸地区玉器雕琢的两种标志性技术——管钻和线切割，均已在此阶段出现。

第二阶段：礼玉阶段（约5500年前至商末）

这个阶段的玉材已被神化，被做成卜筮、祭祀、陪葬的礼器。和美玉阶段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古人对于软玉，亦即闪石类玉材，已有了明晰的辨别能力。无论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还是良渚文化和齐家文化，所见用材已大多是透闪石类的软玉。与之相对应，随着玉雕技艺的提高和抽象思

【1】见费孝通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燕山出版社，北京，2002年。

维、造型能力的拓展，这一时期的玉器出现了大型化、系列化的趋势。红山文化的玉龙、良渚文化的玉琮均已超过了30厘米高，个别器物则超过了50厘米。红山文化出现了玉璧、斜筒形玉器、勾连纹玉佩、玉镯、玉握等系列玉器。良渚文化则形成了有玉琮、玉璧、玉钺的礼玉系统。无论是造型还是雕刻，这一时期都是我国史前玉器的一个高峰，它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以及影响力也是空前的。

第三阶段：德玉阶段（商末至西汉初）

这个时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阶段，也是中国古代玉文化核心内涵的形成阶段。由于青铜器大量出现，玉礼器的主导地位让位于铜礼器。虽然到战国时期，玉礼器仍很繁荣和发达，但西周时期形成、春秋时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士大夫阶层赋予了玉器“德”的内涵，此点尤为重要。自此以后，“君子”和“玉德”成为互相关联的两大内容。追求玉的洁白无瑕、致密温润，即“首德次符”成为爱玉首选。如此遂使和田玉逐渐成为宫廷用玉。

第四阶段：吉玉阶段（西汉初期至魏晋南北朝）

这个阶段的方术文化一度普遍流行，在此背景下，西汉不只出现统治者深信可保尸体不腐的玉衣，还出现了一批辟邪趋吉的器物，典型的有刚卯、严卯，司南佩，翁仲，四灵压胜等。从此，玉具有辟邪保吉的功能成为民众共识。

第五阶段：民玉阶段（隋唐至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有两个特点：一、玉器从之前只有世家大族或官员才可以使用佩戴的专用物品，逐渐走向民间，成为有钱即可以拥有、买卖的物品。二、玉器的功能逐渐生活化、世俗化。

第六阶段：福玉阶段（明清时期）

自宋代以后，玉器的功能走向世俗化。到明清时期，玉器的设计和造型主题基本上可以用“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来总结，有“连升三戟”、

“平安无事”、“瓜瓞绵绵”、“多子多福”、“马上封侯”、“五福献寿”等，祈福、祝福的主题成为主流并流传到今天。

以上六个阶段依序发展，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点，也都具备各自的重要性，但真正使中国玉文化历久不衰，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标志的，还是德玉阶段，这均和士大夫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相关。

士的萌芽至迟在商代晚期已开始，《史记》的记载大概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史记》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1】}西周时期，士的阶层逐渐形成。至春秋时期，由于各国争霸，士这个阶层首次有了亮相的机会，于是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思想高峰形成。由此可见，士的阶层首先是以思想者的形象面世的。对春秋以降的历史，我们可以把隋唐时期作为分界线，把士的作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隋唐之前，士主要是作为幕僚发挥作用；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产生，文官阶层逐渐形成，士的作用通过文官阶层来发挥。综合士大夫阶层产生的历史，他们的作用似乎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 一、历代政府管理的人才库。
- 二、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造者。
- 三、上层统治者和下层百姓之间的沟通桥梁。
- 四、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者。

士大夫阶层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也是引领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主流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之初就十分注重自身道德和修养的修炼，充分体现在古代典籍中关于“君子”精神的论述中。

在先秦古籍中，《论语》、《孟子》、《诗经》、《春秋左氏传》、《周易》，都有关于“君子”的大量论述。士大夫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孔子率先系统地论述了“君子”的人格和修养要求。孔子认为君子的核心是道德，道德体现在“仁”上。而所谓“仁”，第一是正确处理家庭血缘关系，孝敬长

【1】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一册，中华书局，北京，1982年，第111页

辈，抚育晚辈。第二是爱人，并推己及人。第三则是“克己复礼”，保持内心的分寸，“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人际交往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和而不同”。

在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物质生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

在言行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

在修养途径上，孔子认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在精神风貌上，《论语》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总之，孔子认为“君子怀德”，有德是一个君子最重要的表现。^[1]

《孟子》则认为做君子是人的天性，君子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浩然正气”。君子精神从过去对君王的要求，逐渐成为对士大夫阶层整体人格和精神的要求。这种要求从萌芽到完善，再到形成体系，延续了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在这个过程中，孔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孔子不但详细论述了君子之德的种种内容，而且明确地把君子之德和玉德相提并论。

亦即：

仁：温润而泽

知：缜密以栗

义：廉而不刿

礼：垂之如坠

乐：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浊然

忠：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信：孚尹旁达

天：气如长虹

地：精神见于山川

德：圭璋特达

道：天下莫不贵之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由此，钟情于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本能爱好。尊玉爱玉不但不是玩物丧志的表现，反而是修身养性的操守。士大夫阶层历来是社会价值观和社会风尚的

[1] 杨天石：《君子——儒学的理想人格》，《江苏文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引领者。上到帝王贵胄，下到平民百姓，无不爱好玉石。可以说，玉文化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士大夫文化，而士大夫文化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密不可分。在中国，离开了士大夫文化就无从谈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和中华文明的特点，也无法真正弄清楚玉文化。玉文化不过是“君子之德，中庸之道”这一传统文化核心的物化反映而已。也许，弄清这一点才是费孝通先生当年倡议的真正初衷。

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想法始于2005年。这一年我筹备了中国玉器研究会第五次研讨会，即江阴会议。参会者有130多人，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提交了70多篇论文。江阴会议给我的印象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在人才队伍建设、文献考证梳理、考古资料发布与研究三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应该可以做一些系统性的工作了。但撰著一部有关中国玉器的通史，非同小可，做这项工作与编纂玉器图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由于这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工作，不但难度大，失败的可能也大；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完成了，也可能吃力不讨好。我又想：这项工作总要有人做，也许今后会有人建设中国玉器史的高楼大厦，而在目前若能搭建一间茅草屋也是有意义的。联想到费孝通以九二高龄仍然不辞辛劳地为玉文化的研究奔走呐喊，更觉得自己为之做些工作是责无旁贷的。2007年秋，我和曾卫胜、张宏明、孔富安四人在南京共同商议了撰著《中国玉器通史》的具体想法步骤。同年冬天，编委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方向明、孔富安、王昱东、喻燕姣、吉琨璋、李银德、王志高、左骏、刘云辉、张宏明、张尉、周晓晶、曾卫胜。会议做了各卷的分工并提出花一年到三年时间完成，各卷争取做到三个“一网打尽”：考古资料一网打尽；相关文献一网打尽；研究动态资料一网打尽。在此基础上再展开写作。

事情的发展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先是有个别作者因工作繁忙退出，方刚和欧阳摩壹两位同志遂参加本套书的撰著。后来则是孔富安同志突发脑溢血不能再从事《中国玉器通史·新石器时代北方卷》的写作。关键时

刻，方向明和周晓晶两位不计辛劳，无怨无悔地接过他的工作，并妥善地将其完成。《中国玉器通史·宋辽金元卷》的写作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张宏明同志患脑梗，他是在恢复期中坚持把其文稿完成的。

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玉器通史》即将问世，作为主编，我应该将本书的不足之处坦率地告诉大家：就一部通史来说，七年的时间其实是很仓促的。而且，由于各卷作者工作的繁忙程度不同，对待写作的态度不同，各卷的质量是有一些差别的。另外，由于编委会希望各卷尽量反映各个时代的特点和状况，在体例上并没有做太多的硬性规定，因此读者在阅读本套书时难免会觉得同中有异。尤其要说明的是，春秋时代的相关内容在《中国玉器通史·周代卷》有反映，但非常单薄，这个不足只能在本套书修订时再弥补了。

回眸七年，时光荏苒，在此，我要感谢作者团队的友爱和团结。这些年，我们为写作这套书不断讨论和商榷，从编写体例到材料取舍，观点的交流和争论使我们亲如家人，每逢有困难，总有人主动站出来承担，无怨无悔。

我也感谢昆山台商会的陈桂祥先生，他是我多年的好友。2007年此书启动时，他主动为我们提供了第一笔资金，使项目得以顺利开展。我更要感谢杨伯达、卢兆荫、云希正、李学勤、牟永抗、杨震华等先生对我们的热情支持和悉心指导。在你们的指导下，我们才走上了研玉之路。

最后，衷心感谢海天出版社的领导和各位编辑，感谢你们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你们为这套书付出了非凡的努力和心血，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

玉文化是物化的士大夫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当今之世，传统文化正在回归，蕴含“君子之德，中庸之道”的玉文化一定会在今后得到弘扬和光大。

陆建芳
2014年7月

明代自公元1368年至1644年，历时276年，共有16帝17传。明王朝跨越4个世纪，上承元朝，下启清朝，处于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后的汉族统治帝国。时值世界范围正发生重大变革，欧洲一些国家已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中国也开始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作为这样一个特定时期，明王朝显示出与前后时代一些本质上的不同：既有原先历史留下的深深烙印，又有自己创造的鲜明时代特色。

有明一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时代。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1】}，声威远播，万国来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据绝对强势地位。经济总量占世界的45%，如明代铁产量为北宋的2.5倍，永乐初年铁年产量高达9700吨，而当时世界各国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也只有2400吨^{【2】}。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百余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7000吨至1万吨，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3】}。

明代的文化、科技亦成就卓著。

【1】（加）卜正民著，方骏等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在英文版作者序中认为：“明朝时期的世界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欧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第2页。
【2】《环球时报》编：《复兴之路·历史篇》，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16页。
【3】（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210页。

永乐元年（1403）至永乐五年（1407），《永乐大典》成书，凡22937卷、11095册，为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文学上，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成为现实主义作品的出色代表，吴承恩的浪漫主义作品《西游记》引领了神魔小说的创作高潮，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则是拟话本的名作，戏曲杰作则有汤显祖的《牡丹亭》。此外，元末明初出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名通俗小说也是在这个黄金时期才得以刊印流传。

艺术上，浙派、江夏派、吴门画派等文人画与院体宫廷绘画并行不悖、相互映照，呈现出百花竞放的绚丽景象。尤其吴门画派的崛起成为时代画风的主流。晚明更是先后出现如徐渭、陈洪绶等不拘成法、极具个性的画家。

工艺美术上，手工艺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民族风格发展的成熟时期，基本具备了近代艺术的主要特征。典雅名贵的官窑瓷器（如永乐“卵幕”白瓷，永乐和宣德青花、霁红和霁蓝，弘治黄釉，成化斗彩和孔雀绿，嘉靖和万历青花五彩等）、古朴端庄的宣德炉、华丽富贵的景泰蓝、千文万华的剔红漆器、扬州江千里制漆器、五色炫耀的丝织品（“妆花”、“织金”等）、俨然图画的海派顾绣、清逸脱俗的嘉定竹刻、简练优美的明式家具、绘刻精美的饾版和拱花彩印版画技术（《萝轩变古笈谱》、《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笈谱》）等，既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也反映了当时生产与科技的水平。

科技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及黄成的《髹饰录》等私人专业著述，反映了当时农业、水利、地理、医药及其他自然科技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所处的领先地位及其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明初，在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统治的同时，针对战后土地荒芜、村落丘墟、人民流离的残破景象，太祖重本抑末、打击富户，提倡节俭、禁止奢靡，其“官

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1]，俭而中礼。申明“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庶民之家不许衣锦绣”^[2]。通过安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以及严刑峻法等重建统治秩序的诸措施，至明成祖永乐年间，已天下富庶，岁收丰足，外省府县仓米堆积，腐不可食^[3]。社会风俗淳朴敦本，遵制循规，尚礼重义，贵贱尊卑有别，帝国国势达到顶点。民安乐业、质朴无华是当时社会的显著特征。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8年间，宦官郑和率水手、官、兵27000余人，乘“宝船”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7次出海远航，经南海入西洋，历经占城（今越南南部）、彭亨（今属马来西亚）、暹罗（今泰国）、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满刺加（今马六甲）、苏门答刺（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端）、南巫里、古里、甘巴里、阿拔巴丹（此四地在印度半岛西部）、加异勒（在印度半岛南端）、柯枝、锡兰、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忽鲁谟斯（在波斯湾口，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木骨都束（今非洲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刺哇（今索马里布腊瓦）、刺撒（今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亚丁附近）、阿丹（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祖法尔（今阿拉伯半岛东南岸多法尔一带）等亚非30余国，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扩大了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船队规模庞大，装备精良，技术先进。最大宝船长达135米，排水量近2万吨，而当时西方最大的船只排水量不过1500吨。87年后，即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时，旗舰“圣·玛利亚”号的排水量仅为233吨^[4]。李约瑟认为，15世纪前期，明代海军“比之其他任何亚洲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的海军都要强大得多，而且当时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的全部海军）能够与之匹敌”^[5]。

[1]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一七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台北，1962年，第2669~2670页。

[2] 《明太祖宝训》卷三《勤民》，《明实录·附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台北，1962年，第223页。

[3] 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中华书局，北京，1997年，第513页。

[4] 《环球时报》编：《复兴之路·历史篇》，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17页。

[5] （英）李约瑟著，汪受祺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三分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2008年，第535页。

但作为极端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央集权，明王朝虽然太祖、太宗（成祖）均以百战创业，勤于政务，后又有“仁宣致治”、弘治中兴。然而，至武宗、世宗、神宗、熹宗诸朝，则荒政怠国，仅能维持守成而已。如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皇帝，14岁继承帝位，为长命百岁，迷恋道教方术，与宋徽宗一样得到了“道君皇帝”之名，并使与佛教同为官方宗教的道教，在嘉靖朝达到最为风光的时候。他日事斋醮，虔诚焚修，宠信方士，无以复加，还于后宫设立道场，深居简出，20余年不视朝，纲纪废弛，“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帑藏匱竭”，所谓“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1]。并不听群臣谏劝，“侈兴土木”，营建宫室，“或一木而役夫万千”，伤亡惨重，民众苦于采木、烧砖，窑户多逃。世宗讲究灵异、祥瑞，追求方书、龙涎香、灵芝草。上有所好，下必有效，各级官吏竞相进贡白鹿、白雁、白鹤、白猫等各种祥瑞之物，“臣民献芝草瑞物者纷纷矣”^[2]，最终世宗因过度食用长寿丹而暴亡宫中。而神宗皇帝与之相比亦毫不逊色，其在位48年，其中30年不郊、不庙、不朝、不召臣僚议事，在张居正改革失败后，更是深居后宫，纵欲玩乐，不问政事。另外，正德时，武宗游戏成性，放荡不羁，好武、斗鸡、打毬、造豹房、嗜酒、延番师讲经，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还常私出微行，甚至夜入民家索取妇女，随行军士拆毁民房以供柴火。而熹宗好弄斧锯，如亲手制造漆器、砚床、梳匣之类，还喜骏马、山水、走马之戏、上树逮鸟、好猫、捉迷藏、玩冰床。宣宗以好斗蟋蟀闻名，“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以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3]。明代16个皇帝多数寿命不永，往往30多岁即崩殂，年过40岁的仅有6人，即太祖（71岁）、成祖（65岁）、仁宗（48岁）、宪宗（41岁）、世宗（60岁）、神宗（58岁）。皇帝荒嬉无度，宦官则肆意妄为。有明一代，朝廷文网之密、廷杖之酷、厂卫之虐、宦官之害、朋党

[1] 明·海瑞：《治安疏》，《海瑞集》上册，中华书局，北京，1962年，第218页。

[2]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四三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台北，1962年，第7524页。

[3]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册卷二四，《技艺》“斗物”条，中华书局，北京，1959年，第625页。